

汉代家学管窥

郭海燕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中国自古就有家业世传的传统, 汉代通经入仕的政策进一步促使了家学的兴起。汉代家学主要以经学的传承为主导, 兼及律令、天文历法、讖纬、史学、文学等, 家学的受教者以男性为主, 女性也可以承袭家学。家学的传承对士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汉代; 家学; 士族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0)04-0061-03

家学是在一个家庭或家族内部世代相承的学问。中国自古就有家业世传的传统, 伴随着汉代独尊儒术、通经入仕政策的推行, 许多家庭或家族更是株守一经或数经, 世代相传, 从而促使了家学的兴盛。尤其是自东汉以后, 许多经学世家因累世传经而致累世公卿, 形成士族。本文拟对汉代的家学作一探讨, 以了解汉代家学的面貌并管窥家学对士族形成的影响。

一、汉代家学兴起的原因

1. 中国古代家业世传的传统

中国自古就有家业世传的传统。在春秋以前, 中国文化教育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学在官府”, 文化知识掌握在世卿世禄的官吏手中, 如太史、巫师掌握着天文历法、医药等知识和技术; 司徒、司空垄断着农业和工业知识、技术。这些学问技艺都是子就父业, 世代相传, 别人无缘染指。在春秋战国时期, 官学衰微, 私学兴起, 但仍保留了家业世传的传统。比如齐桓公和管仲为了巩固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 要求“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并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子就父学, 弟从兄学。技艺如此, 学业更是如此。正如赵翼所言: “古人习一业, 则累世相传, 数十百年不坠。盖良治之子必学为裘, 良工之子必学为箕, 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 况于学士大夫之艺术乎。”^[1]

2. 汉代通经入仕政策的诱导

在董仲舒的建议下, 汉武帝“罢黜百家, 表彰六经”, 明经成为入仕的一个重要途径。士人只要通经, “其取青紫如俯拾地

芥”^[2], 这无疑为出身寒微的下层士人提供了一条谋取功名富贵的进身之阶。在利禄之途的吸引下, 社会上习经、读经蔚然成风。许多人因明经而担任地方长吏或中央高官, 位至宰相者也不乏其人。西汉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 封侯, “天下学士靡然乡风”^[3]。鲁国邹人韦贤、韦玄成父子以明经历位至丞相, 因此邹鲁地区流行“遗子黄金满籝, 不如一经”的谚语^[4]。对此, 班固之语可谓一言中的: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开弟子员, 设科射策, 劝以官禄, 迄于元始, 百有余年, 传业者浸盛, 枝叶蕃滋,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大师众至千余人, 盖禄利之路然也。”^[5]当时的经学家通常拥有大量门生, 但自己的子孙总是被视为正传所在, 又加上经学事关利禄, 所以经学大师的后裔总是世守祖业, 相传数世不坠, 从而形成家学。

不唯士人汲汲于明经入仕, 许多凭藉军功起家或通过经商、经营田庄拥有了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官僚或豪族, 为了保持本家族的繁荣昌盛和世代高官, 也有意转变自身的特质, 重视家族子弟的经学教育, 从而发展成家学。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为东汉邓禹一门。据《后汉书·邓禹传》, 邓禹以军功起家, 但其本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年十三, 能通诗, 受业长安”。在辅佐光武帝平定天下之后, 鉴于东汉重儒术的社会风气, 他“有子十三人, 各使守一艺”。邓禹之孙邓弘“少治《欧阳尚书》, 授帝禁中, 诸儒多归附之”。邓弘之子邓甫德亦“学传父业”。邓禹的孙女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 十二通《诗》、《论语》。不仅如此, 在汉安帝时, 邓太后又“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 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 并为开邸第, 教学经书, 躬自监试。”^[6]这样, 以军事起家的邓氏一门就转变为具有家学传统的文化家

收稿日期: 2010-05-22

作者简介: 郭海燕(1978-), 女, 山东淄博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史研究。

族。

二、汉代家学的传授概况

1. 家学的传授者

汉代家学的传授者主要是父兄或家族中的长辈。如世传《尚书》的夏侯氏家族一向注重对家族子弟的培养,最初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传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夏侯胜,夏侯胜又事同郡蔺卿;夏侯胜传从兄子夏侯建,又事欧阳高。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汉书·儒林传》中记载的“某氏之学”,基本上都是学业的父子相传。母亲在家学的传授中也往往承担着重要角色。如《后汉书·邓禹传》载,邓氏一门在安帝时期被诛后,邓禹之子邓闾“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后闾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后汉书·崔骃传》称崔篆母亲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崔篆之所以明晓经学,应该与母亲的教导不无关系。除此之外,也有的延师来家授教或向名师请教。如上述所举夏侯家便是这种情况,既有族中长辈的施教,同时也向名师求学。而崔寔《四民月令》中关于家族子弟在农隙之际入小学和大学的记载,反映的则应该是家族延师教授族中子弟的情况。

2. 家学的受教者

家学的受教者多为家族或家庭中的男性,但是在许多家庭或家族中女性也可以是家学的受教对象。由于汉代正处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封建礼教正在形成过程中,女性所受的束缚远不如后世那样严重,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相对较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家学的传授中,女子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当时,许多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女子在出嫁前都受过良好的家学教育。其内容除了妇德等规范礼节以外,经学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尚书》,十二通《诗》、《论语》。”顺烈梁皇后,“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7]。明帝马皇后在出嫁之前也有在经学方面的学习经历。蔡文姬博学有才辩,妙于音律,自匈奴回归中原以后,仍然能诵忆父亲所传典籍四百余篇,应是接受其父蔡邕家庭教育的结果。又如刘向家族“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者”^[8]。可见当时官宦家庭的子女涉猎传承家学的绝非罕见。一般家庭中的女性也有传承家学的,如李南“少笃学,明于风角”,其女“亦晓家术”^[9]。当然,总体而言,有机会接受学术教育的女子在汉代女性中还是较少的,大多数女子学习的仍然是纺织、音乐、祭祀、礼仪等基本技能,接受的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

3. 家学的内容

由于通经是入仕的主要门径,所以在汉代家学的承袭中经学占主导地位。汉代经学家世传授的现象不乏其例,如南阳育阳人注丹“世传《孟氏易》”;平原般人高诩“世传鲁《诗》”;乐安千乘欧阳氏“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歆八世,皆为博士”;杨震从父《欧阳尚书》,其子杨秉、孙杨赐皆“少传家学”;韦贤治《诗》,

传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由是鲁《诗》有韦氏学”;甄宇,习《严氏春秋》,“子孙传学不绝”^[1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累世经学”条所举孔氏、伏氏、桓氏三家更是其中的典范;孔氏和伏氏历两汉四百年,世代以经学传家;桓氏虽稍逊其久,但桓荣、桓郁、桓焉祖孙三代皆以明经为帝王师。

当然,汉代家学传承并不限于经学,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职业也常常家世相传。如中国古代的史官掌管着天文历算,需要高深的天文、数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一般都是子孙相袭,世代相承。政府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云:“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张家山汉简《史律》中也有“史、卜子年十七岁学”的规定,史和卜的儿子年十七岁就要做“史学童”和“卜学童”,来学习父亲的技能。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即相继做了太史。

另外,法律律令在汉代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能书、会记、知律令是当时吏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资质,“明法”也是选官的一个重要科目。在汉代出现了许多法律世家,如颍川阳翟郭躬一家,“(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数百人……中子晷,亦明法律……弟子镇,镇字桓锤,少修家业。……(镇长子)贺复至廷尉。……贺弟祜,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镇弟子禧,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延熹中亦为廷尉。……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11]。河南吴雄、子吴诜、孙吴恭,“三世廷尉”,也是有名的法律世家。

除此之外,图讖、方术、文学等都是汉代家学的重要内容。如广陵人刘瑜“少好经学,尤善图讖、天文、历算之术”,“子琬,传瑜学,明占侯,能著灾异”^[12];广汉新都人杨春卿,“善图讖学”,子杨统、统子厚均传承家学,善图讖^[13]。世传文学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涿郡安平崔氏,崔氏是东汉颇具声望的文学世家,崔骃少通经,善属文,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文颇多;骃子崔瑗“尽能传其父业”,“高为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14]。瑗子崔实、侄子崔烈均有文才。

当然,一般的工匠技人和普通劳动者,多无缘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的知识技能也多靠家世相传。

三、家学与士族的形成

“士族”,顾名思义,即“士”与“族”的结合,也就是士人官僚的家族。士族的形成,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两方面在多数情形下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15]家学在这一循环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家学从一开始产生,便与仕途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自有门第,于是而又有累世之学业。”^[16]在汉代儒学入仕的选官制度下,士人纷纷起而治经,由经学入仕,在猎取官场权势之后,又反过来加强财富的积累,发展家族势力。同时,通

过家学的传授,占据文化优势,从而世代为官,形成士族。当时许多人因传家学入仕,甚至位至公卿。据统计,在东汉时期担任三公的154人中,其中23人有家学传统,约占总数的15%左右^[17]。东汉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就是因传家学而累世为官的典型。杨震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因明经入仕,官至太尉;震中子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桓帝时“以明《尚书》征入劝讲”,亦官至太尉;秉子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官至司徒、司空;赐子彪,少传家学,曾担任太尉、司空、司徒。自杨震至曾孙杨彪,四世为三公。世传《孟氏易》的汝南袁氏更是因通经入仕,又以经学传家,形成“四世五公”的世家大族。所以,赵翼赞叹说:“古来世族之盛,未有如此二者。”^[18]

在汉代,拥有家学传统的经师一般拥有极高的声誉,往往吸引众多的门生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成千上万。当时许多官僚同时也是经师,许多故吏、弟子、门生出乎其门。那些累世为高官,累世传经学的家族,更是聚集了大批的依附者。他们在政治上声息相通,互相提携,形成一股社会势力。如汝南袁氏,人称“门生故吏遍天下”,官渡之战前,其家乡“门生宾客布在郡县,用兵据守”^[19]。这样在社会上就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发展成门阀士族。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强调家学对仕途的影响。综观汉代历史,经学世家不一定都能发展成士族,士族的形成也并不是只有经学一途,一些豪族或官僚子弟可以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势,控制选举,以求仕进,而致累世公卿。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所说:“千乘欧阳生,世传伏氏《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借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又如北海的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传业子弟,普传子承。……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服之”,“子孙传学不绝”^[20]。但是,甄宇仅官至太子少傅,甄承亦仅至梁相。世传经学的伏氏一族,其仕宦也并不显赫。又如郑玄一族,也未能发展成官僚世家。

因此,有学者据此指出,学术与仕途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21]。考察汉代经学世家的发展历程,有些经学世家没有发展成累世公卿,可能有多种因素。一方面可能与家庭或家族的家风有关。如伏氏一族,“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22]。史称甄宇为人亦“清静少欲”^[23]。在这种特殊家风的影响下,他们并不汲汲于追求利禄,因此虽然通经入仕,但没有

至累世公卿,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经学世家的籍贯有一定关系。东汉政权建立以后,政治中心转移到关东,关东豪族成为东汉门阀之中坚。要想成为门阀士族,必须是出身于关东豪族或与关东豪族有渊源关系的关东豪族的世家大族,远离政治中心的豪族是难以享受门阀的待遇的。^[24]如巴蜀地区虽然在文翁创办地方官学以后,成为文化发达地区之一,但巴蜀豪族的地位在东汉却未引起重视。

综上所述,汉代的明经入仕政策促使了家学的兴起,家学的形成与家族的仕途息息相关,许多经学世家因世代传经而入仕,甚至发展成累世公卿或世家大族。但是,由于受特殊家风和所处地域的影响,也并非所有的经学世家都可以发展成门阀士族。研究汉代的家学,可以使我们更清楚的了解汉代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

参考文献:

- [1][18]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0、101页。
- [2][3][4][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9、3593、3107、3620页。
- [6][7][9][11][12][13][14][20][22][23]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28、438、2716、1543~1546、1854、1047、1722、2580、898、2580页。
- [8]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46页。
- [10]事见《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传》、《后汉书·杨震传》。
- [1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 [1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76页。
- [17]据黄大华《东汉三公年表》(见[宋]熊方等撰《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知,东汉时期,任三公者共154人,其中23人有家学传统,22人为家世传儒学,有:伏湛、欧阳歙、伏恭、鲍昱、袁安、张酺、徐防、袁敞、李郃、杨震、桓焉、李固、袁汤、刘宠、杨秉、杨赐、袁滂、袁逢、袁隗、马日磾、杨彪、荀爽,1人家世传律令,陈宠。
- [19]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2页。
- [21]胡宝国《汉代的家学》,载《中国古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24]周天游《东汉门阀形成的上层建筑诸因素——东汉门阀问题研究之三》,《学术界》1989年第5期。